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制礼作乐与 西周文献的生成

过常宝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制礼作乐与 西周文献的生成

过常宝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礼作乐与西周文献的生成 / 过常宝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4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 - 7 - 5161 - 5625 - 4

I. ①制… II. ①过… III. ①古文献学—研究—中国—西周时代 IV. ①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182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肖 辉 郭蕾蕾 孙婷筠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83 千字
定 价 7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出版说明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2010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1年3月

目 录

绪言	(1)
第一章 周革殷命与制礼作乐	(8)
第一节 周朝的兴起	(8)
第二节 周公摄政称王	(22)
第三节 制礼作乐	(39)
第四节 设官分职	(58)
第二章 西周的文献活动及文献制度	(71)
第一节 夏商文献活动	(71)
第二节 周初文献活动	(82)
第三节 西周文献职事	(95)
第四节 西周文献制度	(107)
第三章 神道设教与“书”文献	(128)
第一节 “书”的生成	(128)
第二节 周初八诰	(138)
第三节 其他“书”文献	(154)
第四节 “书”的编纂	(167)
第四章 观象取义与易占文献	(175)
第一节 卜筮和易占	(175)

第二节 《周易》的编纂	(188)
第三节 易占的礼乐文化功能	(199)
第四节 其他占卜文献	(218)
第五章 礼制建设与“诗”文献	(226)
第一节 宗庙“颂”诗	(226)
第二节 从“颂”到“雅”	(238)
第三节 变雅与讽谏	(254)
第四节 “诗”的编纂	(265)
第六章 宗族观念与彝器铭文	(276)
第一节 彝器及相关制度	(277)
第二节 铭文的功能	(285)
第三节 铭文中的宗法意识	(298)
第四节 铭文的文体意义	(307)
结 语 礼仪文献及其发展	(319)
第一节 礼仪与文献的生成	(319)
第二节 西周其他文献及影响	(331)
第三节 走出仪式的文献	(343)
主要参考文献	(354)
索引	(360)
后记	(369)

Contents

Introduction	(1)
Chapter One The Zhou Revolution over the Shang Dynasty and "Ritual Formulation and Music Composition"	(8)
Section One The Rise of the Zhou Dynasty	(8)
Section Two The Regency of the Duke of Zhou	(22)
Section Three "Ritual Formulation and Music Composition"	(39)
Section Four Designing Officialdom and Assigning Posts	(58)
Chapter Two Activities and Institution of Texts in the Western Zhou	(71)
Section One Activities of Texts in the Xia and Shang dynasties	(71)
Section Two Activities of Texts in the Early Zhou	(82)
Section Three Officialdom of Texts in the Western Zhou	(95)
Section Four Institution of Texts in the Western Zhou	(107)
Chapter Three "Creating Teachings to Explain the Mysterious" and the Texts of the "Documents"	(128)
Section One The Making of the "Documents"	(128)
Section Two The Eight "Declarations" of the Early Zhou	(138)
Section Three Other Texts of the "Documents"	(154)

Section Four	The Compilation of the <i>Documents</i>	(167)
Chapter Four	"Observing Things to Find the Meaning" and the Texts of Divination	(175)
Section One	Divination and the <i>Book of Changes</i>	(175)
Section Two	The Compilation of the <i>Book of Changes</i>	(188)
Section Three	<i>Book of Changes</i> and Cultural Functions of the Ritual and Music	(199)
Section Four	Other Texts of Divination	(218)
Chapter Five	Establishing Ritual Regulations and the Texts of "Songs"	(226)
Section One	"Hymns" of the Royal Household	(226)
Section Two	From "Hymns" to "Odes"	(238)
Section Three	"Mutated Hymns" and Suasive Remonstrance	(254)
Section Four	The Compilation of the <i>Songs</i>	(265)
Chapter Six	The Concept of Household and Bronze Inscriptions ...	(276)
Section One	Bronzes and Institutions	(277)
Section Two	Functions of Inscriptions	(285)
Section Three	Concerns of Household Rules in Inscriptions	(298)
Section Four	Stylistic Significance of Inscriptions	(307)
Conclusion	Texts on Ritual and Their Development	(319)
Section One	The Making of Ritual and Texts	(319)
Section Two	Other Texts of the Western Zhou and Their Influence	(331)
Section Three	Texts Beyond Ritual	(343)

References	(354)
Index	(360)
Postscript	(369)

绪言

王国维说：“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①殷商时期，笃信鬼神，文化迷狂蒙昧，《礼记·表记》言其“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及至周公制礼作乐，以政治和道德理性为改革的目标，革除殷商旧俗，“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社会文化和制度为之焕然一新。王国维所谓“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是说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形态和发展范式，对中国此后三千年的发展，有着深刻而持续的影响。

始于周公的制礼作乐，实际上是一场由宗教礼仪到政治制度、文化形态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在礼仪层次上，以祖先和自然神祭祀为核心，推广至各类社会礼仪，逐步制定了包括祭祖、册命、征伐、朝聘、农耕、乡饮酒、婚丧、成年等礼仪规范；在制度层次上，以宗法和分封为大纲，逐步建立起了新的家国一体的政治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承继、官僚、会盟、服色仪仗、井田、历法等制度体系；在意识形态层次上，以“克自抑畏”为起点，倡导反省和忧患意识，褒扬德、敬、谦、俭、孝、义等人格品质。所有这一切，构成了礼乐文化的基本内涵，也就是王国维所谓“制度文物”。周公是制礼作乐的倡导者、领导者和实践者，他通过对殷商礼仪的损益，揭开了周代“郁郁乎文哉”的历史新篇章。

^①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10，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第453页。

周公制礼作乐的主要方法是神道设教，也就是借助宗教仪式和神圣话语方式，推广新的政治文化理念。如《周易辑闻·筮宗·原序》所云：“圣人无惑，众人未能免惑。圣人不欲以己意解人之惑，天生神物以前民用，圣人托之，虽曰神道设教，非无是理而矫诬斯世也。”也就是借助宗教传统的权威，才能使百姓信服。神道设教的前提是一定程度上的政教合一。周公摄政称王，为制礼作乐奠定了基础，也是周初宗教和政治由合而分的关键点。周公凭着掌管宗庙祭祀的特权，假先祖之灵而诰教天下，是神道设教的具体实践。在其还政成王前后，又成功地将政治训诫和礼乐教化之权授予“耆老”和巫史人员，从而使得新的礼乐文化精神在宗庙祭祀之外仍可得以制度化地发展。

《礼记·王制》所谓“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周礼·大司徒》所谓“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就是所谓礼乐教化。在这一过程中，礼乐由宗教祭祀以及与宗教秩序有关的仪式，转变为道德律令和自我人格养成的手段。教化，从此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最为理想的政治方法，“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成为历代最重要的政治目标，并一直延续到今。

制礼作乐必然导致文献生成方式、功能的变化，导致文献编纂的出现，也推涨了全社会的文献意识。

首先，殷商文献，无论是何种形态，基本都具有宗教性质，它们是人神交往的手段和结果，虽然包含有很多信息，但一般不会在世俗社会传播并形成意义。所以，殷商文献在脱离了宗教仪式后，就不再具有社会交往的功能。但西周文献不同，它们同样产生于宗教仪式之中，起着人神交通的作用，但在仪式结束之后，无论是被藏于盟府之中，还是镌刻在彝器之上，或者是由乐太师授之于学宫之中，文献的功能并没有被冻结，而是继续发挥着规范、鼓励、教诫、交流等作用，维系着个人和家族、当下和历史、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西周礼乐文献从宗教行为中获得合法性，却主要是在世俗社会中发挥着作用。这是西周礼乐文献和殷商文献的区别之一。

其次，制礼作乐的目的是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的革新，是新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规范的确立和推广，而这些在相当程度上要依赖礼仪活动。西周史官、祝官、乐官等为各类礼仪活动提供命辞、祭辞、训诫辞、歌辞等，并通

过这些“辞”来推广礼乐精神。仪式为制礼作乐提供合法性保障，也提供思想和方法的资源。随着制礼作乐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尤其是在缺少如周公这样的精神领袖的时代里，人们始通过追忆的方式，将前代礼仪或传说作为文化创造的资源，于是，追溯性或转述性礼仪文献开始大量出现。民间宗教礼仪或者歌谣、传说，也都可能被搜集、改造，成为制礼作乐的又一重资源。西周时期的文献产生方式，要较殷商更为多样化，也更具创造性。

再次，随着制礼作乐的深入，宗教性渐趋淡薄，文献会在一定程度上代替礼仪，作为话语权的保证，这时，一些不依赖仪式而只是纯粹表达教化意义的文献开始出现，并受到敬重。如传说为西周初年的史佚的语录，或者是西周后期出现的政治讽刺性歌谣，从其内容来看，已经和后世文人文献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虽然，“史佚之言”出自史官，而讽刺诗也是在无算乐的仪节中呈现出来，多少还具有一些礼仪传统的影子，但它们的社会化的因素更多、更值得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史佚之言”开创了“语”文献的传统，它和讽刺诗一样，在文本形态上都有一些容易识别的规范性，正是这些规范性，使得“文献”的特征和意义凸显出来。西周时期还有一些文献也具有同样的过渡性特征，如青铜器铭文，它产生于赏赐仪式之中，并且一直作为宗庙重器而仪式性地存在着，但它的纪事述功的内容和载录方式，使得它有可能在脱离了仪式以后仍然保留着教诫作用。可以说，春秋时期最为常见的文献形态：诗、语、史记，都已经在西周时期萌芽和发展。这三种文献形态是春秋时期礼乐文化得以延续的重要方式，并且基本不具有宗教或仪式含义，可称为“君子”文献。

制礼作乐还促使了文献职事和文献制度的发展。“史”是最早的文献职官，是甲骨卜辞的载录者和保存者。殷商史职转为周人服务后，在制礼作乐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至少到西周中晚期，已经有了“太史寮”这样专门的史官衙门，不同文献的撰制、载录、保存等，往往分属不同的职事。史官之外，“大祝”掌六辞、卜官掌三易、宗伯“陈天下之谟”，等等，皆各有文献之职事。此外，西周乐人也是制礼作乐的重要力量，他们是乐舞、歌谣等文献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尤其“大师”一职，还从事着以诗书礼乐教授“国子”的工作。西周的文献意识首先来自代殷而王天下的合法性的诉求，周人将“典册”看成是具有权力合法性的依据，为此，西周建

立了较为完整的文献制度：在周王宗庙中设有天室、图室、盟府等文献典藏之所，周庙之外，各府衙亦有文献收纳机构。太史所掌文献被区分为“典”、“法”、“则”、“书”、“策”、“事”等，这些文献有可能被用来对贵族、官员进行考核。西周还有采诗制度，所采集之诗由太师加工整理，用于礼仪之中。西周设立了多种学宫，通过教学，举行乡饮、乡射等礼仪，来传播“诗”、“书”、“礼”、“乐”，培育子弟。在学宫之中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关于乐德、乐教、乐舞的理论，促进了文献的传播和阐释。

绵延整个西周时代的制礼作乐，在总体上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西周中期，出于对文献的信仰，人们开始模仿、改编、创造出新的文献。《管子·小匡》说昭王、穆王“合群国，比校民之有道者，设象以为民纪，式美以相应，比缀以书，原本穷末”，说明在西周中期有过一个文献编纂的高潮。《尚书》、《逸周书》、《诗经》中相当一部分篇章即产生于此时。但制礼作乐也非一帆风顺。《国语·周语上》太子晋曾提到“厉始革典”，韦昭解释说是厉王“变更周法”。史书记载，厉王“专利”，并使卫巫“监谤”，后者显然是对周公建立的谏诤制度的否定，而且卫乃殷商故地，“卫巫监谤”似乎与殷商旧宗教有关。显然，这是违背制礼作乐精神的事件，也可以说是礼崩乐坏的开端。但礼崩乐坏并不意味着文献编纂的衰落，礼乐文化深入人心，使得变风变雅得以兴盛，文献的主体性于此得到很好的体现。

西周制礼作乐导致了大量文献的产生，文献又逐渐成为制礼作乐的主要方式，这一过程，既是文化逻辑的必然，也十分复杂。制礼作乐在不同的文化层面、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目的和方法，也就必然会导致文献生成方式和形态的多样性。经过历史的汰择，大多数文献都已经湮没无存，只有少数几种礼乐文献，被视作礼乐文化的经典流传下来。这些文献也可能是在西周之后被编定，经过了删改、掺伪等，很难说是西周时原貌。前人做了大量的辨伪工作，但也难以定讞。保留在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虽然也有年代认定的问题，但较传世文本文献更为可靠。铭文文献的思想价值不如传世文本文献，此前只是被当作史料或语料使用，但从文献文化史的角度来说，它能活生生地再现文献活动的方式和意义，具有很高的价值。本书在综述西周制礼作乐活动和文献状况的基础上，主要对“书”、“诗”、“易”、“铭文”等不同类别的文献进行辨析，以期再现西周制礼作乐与不同文献形态之间的

关系。

“书”类文献，直接起源于周公的制礼作乐活动。收录在《逸周书》中的《克殷解》、《世俘解》、《皇门解》等，载录了周人建国时期的政治、军事和礼仪活动。而《尚书》所收“周初八诰”则是周公在主持祭祀仪式时假借祖灵之名发布的教诫之言，体现了周公“敬德”、“保民”、“慎刑”、“殷鉴”等政治改革的思想。周公将祭祖仪式上的对神之“告”，发展为仪式中的对人之“诰”，使其成为太祝“六辞”之一。“八诰”是周公“神道设教”的具体实践，它不但形成了制礼作乐的基本思想，而且还开辟了训诫政治的基本模式。《大戴礼记·公符》载：“周公使祝雍祝王……祝雍曰：‘使王近于民，远于年，嗇于时，惠于财，亲贤使能。’”这说明周公有意识利用太祝一职建立教诫政治的传统。《逸周书·周祝解》所载全是“周祝垂戒之语”，反映了这一礼教传统的发展状况。又《国语·周语上》有“史献书”的记载，也就是史类职官可以读“书”以谏天子。《世俘解》载“（武王）乃俾史佚繇书于天号”，说明史官是通过读“书”交通天人的，这是“史献书”的宗教传统，而周公所建立的训诫政治则是它的现实基础。一些追溯古史类“书”文献，如《尧典》、《皋陶谟》、《牧誓》等，可能就是在“史献书”这一背景下产生的。这些文章都有祭祀仪式的场面和情节的描写，表明它们可能是对乐舞仪式、传说等的文字性转录。这是西周时期“书”文献产生的又一种重要方式。

“诗”本就是仪式的一部分，与乐和舞三位一体，所以，制礼作乐和“诗”文献密切相关。西周初年，周公将祭祀文王、武王作为最高的典礼仪式，周公制作了《武》、《赉》、《桓》等乐舞以祭祀武王。《国语·周语上》称《时迈》为“周文公之颂”，则“颂”这一名称也可能始于周公，它意味着当时已将某些“诗”根据“颂”的标准编定起来了。颂祖诗是西周礼乐文化最核心的部分。西周中期，随着礼乐制度的成熟，尤其是辟雍礼仪的兴起，典礼用诗更加发达。此时，祭祖礼趋于完善，祭祀的对象以文王、武王为核心，往前追溯至后稷，往后延续到康王，形成了一个连贯的英雄祖先谱系。这些都在“诗”中表现出来。祭祀礼仪之外，举凡农事礼仪、政事礼仪、军事礼仪、燕飨礼仪乃至于婚姻、宫室落成等普通生活礼仪，无不用“诗”，《周颂》、《大雅》中的大部分诗篇都产生于这个时期。西周晚期礼崩

乐坏促成了献诗讽谏的风气，它们主要用于各种典礼的无算乐仪节中，所以仍然是礼仪用诗。仪式中的无算乐部分具有节制性弱、个体主观性强的特征，成为讽谏诗最有利的发布平台。讽谏诗的价值倾向与西周的礼乐传统一致，因此被纳入周王朝“雅乐”之中，成为“变诗”，并在东周平王之时结集。《尚书·舜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诞生于西周时代的“诗”，是中国文化中最具阐释性，也是普及程度最高的经典文献之一。

西周制礼作乐的另一重大成果是《周易》。易占是周人流行的占卜方式，它以“筮数”将人们的卜问与特定的卦爻辞联系起来，通过解读卦爻辞以预言吉凶。在制礼作乐过程中，西周太卜、筮人等对早期数字卦占卜方式进行改造，并利用卦爻辞的方式，统一了多种民间占卜形式，同时使得筮占更加规范化，这才形成易占和《周易》文献。现存《周易》卦爻辞中，至少包括数字占、象占、谣占、史事和占筮实录等内容。《周易》以占卜为出发点，指归却在于具有训诫性的大义，是神道设教的典范。《周易》以象征着天、地、山、泽、雷、风、水、火的八种卦形为世界构成的最基本元素，通过各种组合，以及爻位的变化，构成了一个无所不包而又富于变化的象征系统。通过这一象征系统，《周易》表达了对自然、世界、人生的观点。《系辞下》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易》的忧患意识来自商周易代的反省，内容则为对天道变易的敬畏，以及克制和谨慎的人生姿态。《周易》阐发“变易”思想，但认为世界是可把握的，显示出较为乐观的理性态度，反映了西周的礼乐文化精神。《周易》阴阳平衡、物极必反、观象立义、整体性、关联性等思维方式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魅力的部分。《周易》之外，仍有物占、星占、望气、梦占等占卜形式在社会上流行。《山海经》即为一种包括了“物怪”占卜和祭祀的文献，它的编纂与多种图画文献有关。

青铜器及其铭文主要用于与祖先神灵沟通，其精神内核是慎终追远和光大族姓的宗法意识。西周制作青铜器的目的是祭祖和陪葬，而制作的契机则可能是得到周王的册命或赏赐，或者是缔定契约等，西周人认为这些事情对家族十分重要，都应该铭刻在青铜器上。青铜器的样式和陈列方式，有着礼制的规定性。青铜器作为家族性祭器，殷商时代既已存在，但以铭文的方式

颂扬祖德，纪述勋劳，感念王恩，这是在西周制礼作乐背景下出现的，主要体现了宗法意识下的家族伦理。铭文显示了在世者与祖先亡灵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所以祭享类铭辞最多；铭文往往载录周王册命和赏赐的原因和过程，有为在世者纪功的目的，但却被归因于祖德的护佑；同时，铭文还表达了氏族和王室的亲密关系，等等。多数情况下，铸器原料来自王的赏赐，所以，铭文中所表达的福泽绵长的家族观念，以及对王恩的感戴之情等，是得到周王的鼓励的。这就是“对扬王休”、“子孙永宝用”等颂辞、嘏辞的意义所在。可以说，基于宗法思想的家族伦理和政治意识，是青铜器铭文的主要文化功能，它深刻地反映了礼乐文化的精神内涵，这也是“器以藏礼”的真正含义。青铜器铭文由于转载了宗庙册命或赏赐中的诰、命、记、誓、训、颂等内容，又被后人看作是一种具有训诫意义的文体，对后世各种形式的器物铭，以及脱离了器物的铭文、诂文文体等，都有重要的影响。

除以上这些文献，本书还穿插讨论了“语”、“史记”、“约剂”等其他形式的文献。并根据西周礼乐文化和文献自身的发展情况，讨论了春秋时期几种主要文献形态产生的根源。

总之，周初制礼作乐是为了稳固周族统治而进行的政治文化改革，也是文明自身发展的必然进程。文献既是制礼作乐的方法，也是制礼作乐的成果。新意识形态就在礼仪和文献这两端之间生成，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远离仪式而靠近文献。可以说，西周文化改革起自宗教仪式，最终却落在文献上，以多种经典奠基并延续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但在西周时期，甚至在整个先秦时期，文献背后的仪式性张力一直存在着，文献的传统总能够追溯到仪式中去，并从中获取合法性和话语权力。因此，只有从制礼作乐的背景上来讨论文献，才能真正理解先秦文献的生成、方式和文化功能。本书根据以上的思路，希望对西周时期的制礼作乐和文献发展做个较为全面的清理，但囿于学术水平和文献资料的限制，很难说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期望能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和指教。

第一章

周革殷命与制礼作乐

周朝的建立，以及由此开始的一切政治、文化革新运动，为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础，并指示了发展的方向。可以说，商周之际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转折点。周民族的文化传统，殷商王朝倾覆的教训，以及周公本人杰出的治国才能等，都是造成这一转折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周公制礼作乐活动，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回顾这一阶段的历史，梳理制礼作乐的过程和内容，认清西周政治文化形态，对我们理解传统文化的发生和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周朝的兴起

中国文明从文献上可以追溯到虞夏时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①，介于公元前 21 至前 17 世纪。自夏到商，中国文明的累积日益厚重，并在殷商中晚期达到相当昌盛的阶段。夏商文化的共同特点是重巫鬼、轻人事，在政治结构上保留着部落联盟的痕迹。武王伐殷，周王为天下共主，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形态，将中华文明带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一

周人先祖弃，生活于夏朝。《史记·周本纪》载帝舜“封弃于郟，号

^① 二里头文化偃师遗址出土有大型宫殿基址，陶器上亦可见刻画符号，因此，夏朝的国家形态可基本得到确认。详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